

中国的新城镇化进程与行政区划调整

邱娟, 汪明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 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城镇化显现出新的特点。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显现的新特点; 其次, 剖析了各区域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 最后, 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提出了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一系列对策。

关键词: 新城镇化; 行政区划; 特点; 对策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1 新城镇化的特点

2005年10月11日,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并将其载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立即引起了各级政府、经济学界、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2008年10月12日, 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 又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其中提到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大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这一切表明城镇化实际上已成为我国现今和今后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21世纪, 我国的城镇化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与上个世纪相比, 呈现出新的特点。

1.1 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回顾一下上个世纪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图1), 80年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加0.89个百分点, 90年代为0.79个百分点^[1]。步入新世纪, 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36.09%增至2009年的46.59%。9年间增加了10.5个百分点, 平均每年增加近1.2个百分点。从这些可以看出我国的城镇化已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发展时期, 截止2009年底, 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22亿人。城镇化使大量的农民转变身份, 成为城市居民, 这样有利于稳定地扩大内需, 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

收稿日期: 2010-12-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840197)

作者简介: 邱娟(1987-), 女, 山东兖州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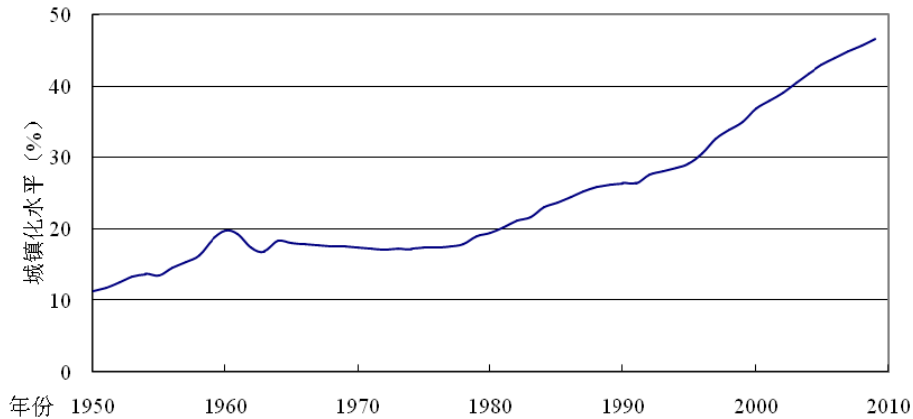


图1 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

1.2 城镇化水平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基本适应，但存在滞后的趋势

钱纳里通过建立多国模型，对100多个国家进行实证检验，提出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世界各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对数相关的关系。即城镇化水平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又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变缓^[1]（如图2）。将2000-2008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和换算过的人均GNP标注在图2中，可以发现：2000-2005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与钱纳里的“标准模式”基本上相适应；2005-200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与钱纳里的“标准模式”的差距逐渐拉大；到了2008年，我国人均GNP已达3350美元，城镇化水平达45.68%，与钱纳里的“标准模式”相比，城镇化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如果综合考虑物价等因素，这个绝对差距可能会小些，但仍然存在滞后的趋势。总体看来，近些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基本适应，但2005年以来，城镇化水平略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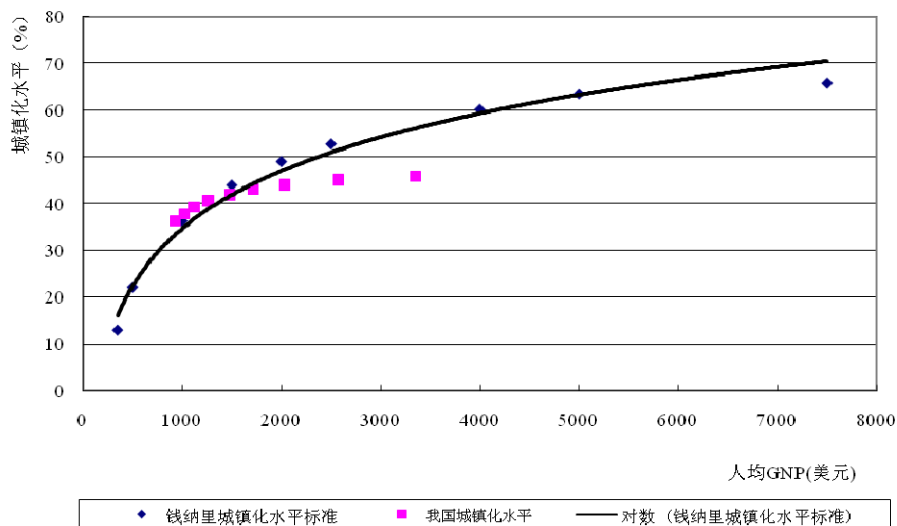


图2 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钱纳里的《发展的格局》^[3]。

1.3 大城市郊区化迅猛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的郊区化现象已经在个别大城市开始显

现。90年代郊区化扩散到更多的城市。2000年以后，郊区化现象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近几年，经济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较大范围内出现了郊区化现象。其中北京、上海、天津等郊区化最为明显，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呈现出中心区与郊区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不仅实现了人口郊区化，还出现了工业、商业、基础设施的同步郊区化。这样即可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通过郊区城镇建设和住宅开发，郊区城镇吸纳了一定规模的中心城区人口，中心城区的户籍人口密度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心城的拥挤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缓解^[4]。

1.4 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均衡

我国地域广阔，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与此相对应，我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2008年，东、中、西地区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比2000年分别变化-0.18%、0.38%和1.15%。另外，2008年东、中、西地区城镇化水平比2000年分别提高了10.13、10.05和9.59个百分点(如表1)，由此可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不均衡，并且东部城镇人口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重在减小，而中西部地区这一比重则处于上升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存在不均衡。

表1 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区域发展状况

项目	年份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城镇人口数(万人)	2000	45906	22653	13706	10207
	2008	60667	29397	18085	13995
城镇化水平(%)	2000	36.09	46.10	32.98	28.73
	2008	45.68	56.23	43.03	38.3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9)。

注:东部地区包括:辽、京、冀、津、鲁、苏、沪、浙、闽、粤、琼(暂不包括:港、澳、台资料);中部地区包括:黑、吉、晋、豫、皖、赣、鄂、湘;西部地区包括:云、贵、川、藏、渝、陕、甘、宁、青、新、桂、内蒙;因为广西与内蒙政策上属于西部大开发地区,因此将其列入西部,与传统的中东西部划分略有不同;另外,本文中东、中、西地区的划分均以此为标准。

1.5 城镇化的动力主体由二元转为多元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化过程,此起彼伏是其最大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城镇化的动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虽有所发展,但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总体上来看城镇化发展速度迟缓、过程曲折,是以政府为主体推动的城镇化,被称为自上而下型城镇化;80年代以后,我国城镇化的动力因素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国家强制因素逐步减少,市场因素逐步增加,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中国城镇化得到较快速的发展。以市场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逐渐成为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推动了许多小城镇的崛起和发展^[5]。

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市场机制已逐步完善,城镇化的动力主体已趋向多元化。政府、企业、个人、外资等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过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1.6 “组团式城市群”现象显著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已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城市群的形成和演化也已经历了100多年。

城市的整合与扩散,从 20 世纪一味追求数量的增长,至 21 世纪追求城市质量的提升。近几年,我国大城市的地域空间不断扩展,城镇密度不断提高。于是一些学者又提出“组团式城市群”的概念,与城市群相比,组团式城市群更注重完整性和跨区域整合,它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它更多的考虑了各个城市群的个性价值,更加注重城市群的整体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各城市群的潜力。另一方面,它更注重不同级别的城市之间的社会分工、功能协调。

我国的经济格局是由“点状拉动”向各大城市群的“面状组合”转变,特别是向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进行集聚。2008 年底,珠江三角洲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 9.1%,长江三角洲占全国的 20.0%,京津冀地区约占全国的 9.1%,这三个大的组团式城市群约占中国经济整体贡献的 38.2%。到 2020 年,中国会在 3%的国土面积上,产生出占国家总财富三分之二的 GDP,真正形成世界大国中具有全球意义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和中国财富积聚的战略性载体^[6]。由此可见,组团式城市群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 近年来行政区划的变迁及其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

行政区划作为中央统治地方及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市制建设上,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空间合理布局,建立科学的社会经济网络,完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都具有重要意义。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对现有行政区划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2.1 行政区划的变迁

所谓城市行政区划变更,主要是指以城市为主要对象的行政区域或行政管理安排的变动,常常能够反映出国家行政结构或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变迁^[7]。近些年,我国地方行政区划格局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城市内部行政区划调整、及地区行署行政管理体制向城市建制制度转型、乡镇规模调整等三大方面。其中城市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集中在五个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整建制地将市或县转型为“市辖区”行政建制,这在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直辖市以及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内部,表现尤其明显;城市政府驻地的迁移,通过政府驻地迁移,置换土地,积累资本,推进新区开发;城市郊区体制的解体,撤销城市郊区,将郊区乡镇分别整合到不同的市辖区,成市辖区带乡镇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基层乡镇向城市社区或街道建制的转型与发展;城市市辖区规模的整合也是一种新的趋向^[8]。

新世纪以来,我国行政区划的基本框架保持稳定。截止 2008 年底,我国省级行政单位有 34 个,即 4 个直辖市、23 个省、5 个自治区、2 个特别行政区,与 2000 年相同。地级行政单位 333 个,与 2000 年相同,但其间有微调,有 20 个地区和 4 个盟改为地级市。县级行政单位有 2859 个,比 2000 年减少了 2 个。期间的变化主要是较大范围撤县(市)设区,据统计这八年间有 32 个县级市和 39 个县通过合并或撤销的形式设区,所以 2008 年地区的数量增加 71 个;另外一个变化是撤销四川省北川县,设立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乡镇级行政单位数目比 2000 少了 9941 个,镇的数量减少 1078 个,乡的数量减少 9485 个,只有街道的数量是增加的,比 2000 年增加 622 个,并且改变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

表 2 中国大陆地区“地区行署”体制向“市管县(市)”体制转型的变化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地区数量	地级市数量	地区数量	地级市数量	地区数量	地级市数量

2000 年	0	98	2	100	42	61
2008 年	0	98	1	101	19	84

注:表中的地区数量包括“盟”,但不包括“自治州”,截至2008年底全国还有17个地区,3个盟。

2000-2008年间,地级市建制的变更,主要发生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没有调整;中部地区增加1个,西部地区增加23个(如表2)。另外,对于撤县(市)改区的行政区划变更方法,在2000-2008年,东部地区通过撤县(市)设了29个区,中部地区设了10个区,西部地区设了34个区(另外在新疆地区设置了3个市,后又撤销一个市)。从数量看国家的分配不是太均衡,西部比东部行政区划调整的数量还多,而且对其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例如1997年我国已经冻结受理地方“撤县改市”申请的审批,但在2002年在新疆又设置了阿拉尔、图木舒克、五家渠三个县级市。这一方面是为了实现政治改革、主要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任务的全国均衡发展而为,另一方面也是借助于行政区划体制的变革,激活西部地区地方管理体制的活力,改善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朝着有利于城镇化发展方向的趋势发展^[8]。

2.2 行政区划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

2.2.1 东部撤县改区对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利与弊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沿海大都市对我国的经济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为了使这些地区协调发展,近年来国家对其做了一系列撤县(市)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经济中心城市或一些特大城市,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将市辖县、市建制地改为市辖区的区划调整方面措施力度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杭州、济南、南京、宁波、苏州、佛山、昆明、珠海、镇江等一些大都市,先后进行了撤县(市)改区的行政区划调整。

撤县(市)改区这一行政区划调整加快了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对地区的人口、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市区的人口大幅增加;其次,解决了长期制约城市发展的用地不足问题;最后,撤县(市)改区对地区的经济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GDP总量持续快速增长。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行政区划也带来一系列弊端:我们国家每五年会制定一个详细规划,地区也是如此,一个地区本来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计划,很可能是中长期的,如果对其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后,无论是被调入区域,还是原来的老市区,都有一定的弊端,原本已经投资或兴建的项目被搁浅,造成了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对于本地居民来说,更改自己用了多年的户籍,心理上有许多不适应;还造成城市持续向外蔓延,耕地资源大面积锐减;而且新扩区域往往会成为中心城市制造、化工等产业转移地点,或者被确定为新的建设基地,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剧增,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2.2.2 中西部撤县改区对地区城镇化的影响

新世纪,我国中西部许多大城市实施了“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例如,重庆、成都、襄樊、宜昌、陇南、西安等城市相继进行撤县改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其初衷是,扩大城市发展空间、统筹区域一体化建设、协调城乡矛盾、减少管理层级、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通过加大城市规模,提高原市(县)的行政级别,原来的农村地区变成街道办事处,农村统一变成城市社区,迎合了中国人重“市”轻“乡”的心理,因此很多人都赞同撤县改区。但是对于中西部市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由于市级政府财政、政策各方面的不足,在经过撤县改区之后,没有进行一系列相关的协调,最终即削弱了原地方政府的自治能力,使其自主发展

能力进一步弱化,又加速了中心城市的极化和近域蔓延式增长,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9]。

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比重比较大。它们在撤县(市)改区之后,逐渐意识到面对市场化浪潮,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结构已走到尽头,必须尽快工业化,区域经济才能走出困境。经过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以2001年襄阳县改区为例,2008年,襄樊市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1002.46亿元,比2000年增加近600亿元。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2008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23.4:47.4:29.2调整为17.5:45.0:37.5,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8.3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市场主体成长加快。

另一方面,撤县(市)改区后,各城区功能定位基本清晰,但是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10]:城市之间定位基本明晰,但实施的广度和力度不足,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相互融合度欠缺;各城区的城市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凌乱不成系统,在现行的行政、交通、制度各项制约下,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整合和利用,实现集约效应从而使价值最大化。

2.2.3 城市市辖区规模整合的影响

近年来,城市市辖区规模调整也日趋频繁。例如2009年,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相继进行市辖区规模整合。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随着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的日益成熟,张江高科技园区以及金桥出口加工区等功能区的不断发展,浦东进一步探索改革试验的操作空间已经略显狭窄,土地等资源的约束在制约着浦东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浦东、南汇两区的合并,充分表明这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举措。两区合并,通过功能的整合与政策效应的发挥,可以达到 $1+1>2$ 的效应。城市行政区域的合并,较为复杂,牵涉面较广。比如,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使人心安定,拿出各方均能接受的整合方案;如何让相关部门顺利对接,避免百姓和企业办事流程的延长;如何在原来两区财力不平衡的情况下,实现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均等化。诸多问题深刻反映出区域合并本身是一项有成本的工程。如何尽量降低合并的磨合成本,发挥整合效益,也将是对新区的一个重大考验。

2.2.4 乡镇规模调整的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全国各地涌现出一大批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强镇,乡镇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乡镇体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弊端,如乡镇数目多,整体规模小;受地方政绩影响,乡镇之间争项目、重复建设严重;乡镇的集聚和扩散受到行政区划的制约,阻碍了地区经济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我国东部浙江、江苏等一些地区率先对乡镇建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政府依据乡镇之间的人口、经济、空间联系、历史沿革的情况,进行了乡镇合并。

乡镇撤并,首先增强了市镇级经济实力,盘活了部分地处偏远的乡镇资产,也使各地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减少了各地在基础设施上的重复投资,发展了规模经济,提高了竞争力;其次,科学设置了机构,减少了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有效减轻了财政负担;最后,有些联系紧密、具有互补性的乡镇合并后,以强带弱,增强了发展后劲^[11]。但是,乡镇合并后带来镇域面积的成倍增大也使管理出现了滞后现象,乡镇管辖范围太大,为民服务效率降低,有些突发事件如处理不及时,会使矛盾尖锐化、复杂化。

另外一种对乡镇规模的调整就是将发展条件较好的乡镇转变为街道,这是城镇化的一种新形势,它既有力的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同时也迎合了城镇化后社会管理的需要,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2.5 省直管县的利与弊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特别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如浙江、江苏等省份,县域经济高速发展,使得这种冲突就逐渐显性化,其表现为市县利益冲突加剧,而在这种冲突中,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地级市往往为了自身利益利用其掌握的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市管县体制的合理性逐渐丧失,反而成为束缚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省份进行“强县扩权”改革或建立省直接对县的财政体制,标志着开始改革“市管县”体制,改革的趋势是走向“省直管县”。从2002年起,浙江、湖北、河南、广东、江西、河北、辽宁等省先后开始了“强县扩权”的改革,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在经济管理方面形成了近似于“省直管县”的格局。2006年6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可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已成为我国整个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改革的时机已基本成熟。

总体上看,我国已经建立或基本建立省直管县体制的海南省、浙江省都是经济比较发达、市场机制相对完善、政府管理能力比较高、面积又比较小的省份。海南省、浙江省建立省直管县体制可行性的代表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至少可以说明,在我国建立省直管县体制是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而且在条件具备的地区是完全可以实行的^[13]。

3 行政区划背景下推进中国新城镇化进程的建议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大国,在其中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城镇化不仅仅是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文化扩散和融合交替发展的过程,涉及到一个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转移问题。新世纪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根据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许多专家进行了预测。据有关专家预测,21世纪的前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每年可增长1.2个百分点,高于改革开放后1979~1999年的平均发展速度。到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超过70%,全国的总人口达到15亿,市镇总人口将超过10亿。并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际和国内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动,以及人们生活观念的一些转变,我国城市的发展趋势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未来中国城镇化呈现出增长重心内移、城乡一体化进程显著加快、城市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等特点。这一系列变化对行政区划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本文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因地制宜地进行行政区划调整

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行政区划改革时所选择的时机和模式也存在差异。行政区划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同样是市领导县市体制,在东部地区已经暴露出明显的制度性缺陷,而在中西部省区仍然处于完善和转型阶段,其制度性优势还没有体现出来。因此,东部与中西部省区在进行行政区划改革时有很大的选择差异。

3.2 实行跨行政区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需要竞争,但在合作基础上的竞争才是最高层次的竞争。未来经济的竞争和合作,已不仅仅是城市个体之间的竞争和合作,而发展为区域、城市群或城市带之间的竞争和合作。

城市政府行为主体之间有的有直接行政隶属关系,有的只是行政平级关系,他们各自代表不同的城市行政区利益,一方面用尽可能灵活的方式充分利用中央和省政府颁发的政策,以利于地方发展;另一方面也努力捕捉跨区域和行政界限的发展机会,扩大对外经济社会文化的横向联系。汪宇明等学者通过对上海大都市区行政区划体制研究后,提出了三种解决大都市的政区空间问题的模式:一是建立高度集权的都市群政府,针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实际情况,在城市政府间建立一级行政机构,负责城市群内各项职能。二是建立松散的城市协调机构,这些机构一般是非政府机构。三是建立城市联合政府,它可以成为都市联盟,协调各政府的利益,解决政府之间的公共服务问题^[14]。

3.3 实现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

目前行政区划最大的问题是行政区与经济区不一致,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行政区与经济区本没有很大关系,经济可在行政区之间自由流动。然而我国行政区的经济功能,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寄生于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但是地方政府在促进本地经济的同时,容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15]。于是一些学者提出,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构建以具有强辐射力的首位城市为核心,以协调互补的城市带为框架的经济区经济。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为实现集聚经济效益,进行规模的扩展而引发空间上的极化效应,并通过一系列整合,逐步形成企业群、主导企业群、伴生企业群;其次,企业群进一步极化,就形成了经济中心,不同中心内的企业由于扩张势能和潜能的差别,从而导致了中心的分离,表现为能级大小不同的主中心、次中心等;最后,由于市场扩张和空间分工的需要,经济中心与其他相邻地区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从而形成极具聚集性的地域经济综合体——经济区经济^[16]。

3.4 加大力度整合城市地区内部的行政区划体制

要整合城市内部的行政区划体制^[14],首先,要整合与规范特大城市地区的二级政区管辖规模和建制。中国的直辖市和特大城市的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市辖区,县(市)体制的完善和创新,关键是取消“市”的通名,使直辖市与特大城市地区的二级政区建制出现市辖区、市、县等多样化的政区建制空间,随着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质量水平的提高,为大都市区直辖的区、市、县之间有因地制宜的发展和相互转型的制度空间。其次,街道办事处建制体制应置于整个城市行政管理体制中统筹改革。随着交通通讯、新闻传媒等管理手段的改善,合并一些小的街道办事处的时机已经成熟。街道办事处的改革要与市辖区和居委会一起考虑,统一规划。总的思路是调整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管辖幅度,扩大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辖区规模;从实际出发调配职能;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在城市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最后,县级市要建构围绕中心城区发展的城镇网络体系。为此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把行政区划调整与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特别是城镇发展的长远规划衔接好,综合考虑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 [1]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9.
- [3] 钱纳里,赛尔奎因.《发展的格局》[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 [4] 吴元波,吴聪林.上海大都市新型郊区化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9

- [5] 宁越敏.新城镇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J].地理学报,1998(5):470-477.
- [6] 牛文元.城市化向组团式城市群跃升[EB/OL].
http://www.tranbbs.com/Techarticle/Techarticle_10450.shtml, 2007-08-27.
- [7] 罗震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变更特征及趋势[J].城市问题,2008(6):77-82.
- [8] 汪宇明,王玉芹,张凯.近十年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格局的变动与影响[J].经济地理,2008(2):196-200.
- [9] 胡晓玲,胡建平,聂东芳.自由经济呼唤地方自治力[J].城市规划学刊,2009(7):12-16.
- [10] 聂雨轩.江山再起——为2800年襄樊城市发展谏言[EB/OL].
<http://bbs.hj.cn/viewthread.php?tid=49410&extra=&authorid=14432&page=1>, 2009-2-17.
- [11] 汪恭礼.对宣州区乡镇合并的调查与思考[EB/OL].<http://www.ahny.gov.cn/html/>,2006-04-03.
- [12] 王孝勇,朱昌好.政府层级改革视角下的“强县扩权”[J].理论前沿,2006(5):15-18.
- [13] 赵世磊.关于在我国建立省直管县体制的探讨[D].贵阳:贵州大学,2008.
- [14] 汪宇明.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地区的行政区划体制创新[J].城市规划,2002(6):22-25.
- [15] 张永贵.加快城镇化的战略选择[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5.
- [16] 常黎.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QIU Juan, WANG Ming-feng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It has become a consens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the city is very important in 21st centur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nomy, China's urbanization shows new features. Firstly, the paper summaries new feature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Finally, according to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s of urbaniz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feature; countermeasure